

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刘民坤^{1,2}, 宋 韵^{1*}, 邓小桂¹, 任莉莉¹

(1. 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南宁 530004; 2. 广西发展战略研究院, 南宁 530004)

摘 要: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探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让村民有序参与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乡村封闭性,重构乡村社会,而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其社会网络的深刻塑造,因此,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如何驱动村民参与治理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通过两个递进的研究探讨“发展乡村旅游—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是否成立,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发展旅游能够提升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及村民的网络位置,增强网络中村民的交流频率、信任强度,促进信息共享,从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重构乡村社会网络,进而,社会网络从信息获取、集体监督、榜样引导、共同体意识4个渠道影响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② 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业缘网络和地缘网络的促进效应较强,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地缘网络和亲缘网络的影响较强;③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类型呈现出“文化建设参与>环境保护参与>政治建设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的特点。

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治理参与;社会网络重构;结构嵌入;关系嵌入

乡村治理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内容,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要坚持村民主体地位,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理论和实践也反复证明,乡村发展必须以村民为主体,让村民有序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是对乡村振兴的极大助力。

近年来,在“城市化”大潮冲击下,乡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使得乡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空心村”

问题显现^[1],同时,受小农经济影响,部分村民长期处于服从地位,片面认为乡村治理是村干部的事^[2]。参与主体的缺失和村民民主意识的缺乏导致乡村治理变成村干部主导下的“选择性参与”,甚至是“村干部自治”^[3]。实践中的乡村治理出现过好人治村、狠人治村、恶人治村、能人治村等多种村治形态,但其本质都是少数人治理^[4-6]。村民参与治理流于形式,“走过场”问题凸显^[7]。因此,如何遏制参与主体缺失,增强村民的主体意识,促使其积极参与治理事务,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课题^[8]。

乡村旅游为提高村民治理参与意愿提供了路

收稿日期:2023-08-02;修订日期:2023-12-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272040);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23GDSIQM13);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1BYJ028);广西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交叉科研项目(2023JJXA03)。[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72272040;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Universities, No. 2023GDSIQM13; Guangxi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Research Subjects, No. 21BYJ028;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of Applied Economics of Guangxi University, No. 2023JJXA03.]

第一作者简介:刘民坤(1979—),男,湖南澧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城乡经济。

E-mail: akun1999@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宋韵(1996—),女,四川资中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乡村治理。E-mail: ashui0129@126.com

引用格式:刘民坤, 宋韵, 邓小桂, 等. 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3): 545-560.
[Liu Minkun, Song Yun, Deng Xiaogui, et al. Paths of tourism promot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reconstruc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43(3): 545-560.] DOI: 10.18306/dlkxjz.2024.03.010

径选择。乡村旅游可以突破乡村边界,打破乡村原有的封闭性,架构城乡要素流动桥梁^[9],加速资本、人才、信息、技术、管理等要素向乡村地域聚集^[10],重构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11],缓解乡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等社会失序问题,激活乡村治理力量。同时,缺乏村民有效参与,将会阻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难以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因此,无论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要求,还是从乡村治理的主体探索,都亟待探究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通过深入研究旅游发展和村民参与治理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通过旅游发展来提高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进而以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此外,也可以为政府和相关利益方制定合适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决策,更好地推动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旅游如何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较少,主要聚焦旅游发展对乡村治理水平、基层组织以及村民的经济利益、身份认知、自我管理水平的等影响。从乡村整体层面来看,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打破乡村地域的封闭格局,推动资源向乡村流动和聚集,提升乡村的治理现代化水平和基层社区的法治化水平^[10,12]。有研究表明,发展乡村旅游能推动优秀党员回流和引进,建立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基层党组织,增强党在乡村基层的组织号召力和群众凝聚力,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治理^[13]。从村民个体层面来看,村民不仅能获得经济利益,还可享受因发展旅游而建设的公共设施,市场机制激发了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14],为规范旅游经营秩序及促进旅游经济健康发展,村民会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充分提升整体素质^[15],实现旅游乡村的自治管理,管理的领域与对象也逐渐由旅游接待向乡村的公共环境卫生、历史文物保护、利益矛盾协调等方面延伸^[16]。同时,乡村旅游发展加速了以村民资格为基础的传统乡村治理向以公民资格为基础的现代乡村治理转化,村民提出了更高的民主参与要求^[17]。总体而言,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为村民带来经济利益、公共资源等,同时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公民意识,增强基层组织的社会号召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进而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现有研究为理解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数研究只是在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整体框架下简要提到旅游对村民参与治理的影

响作用,对二者关系的关注不足,作用机理尚未明确;二是对于两者之间内在机制的探索缺乏理论解释和依据;三是现有文献侧重于定性讨论和描述分析,缺少定量实证研究,未能直观凸显出旅游的驱动作用。

当前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已颇为丰富,从费孝通^[18]的“熟人社会”到贺雪峰^[19]的“半熟人社会”再到吴重庆^[20]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围绕人际关系描绘了不同时空条件下乡村社会的村情概况^[21],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以村民的社会关系为核心,认为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其社会网络的深刻塑造,而乡村旅游能够对乡村社会重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22]。因此,社会网络重构视角有望为研究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提出新思路。

“嵌入”概念最早由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 Polanyi^[23]在《大变革》一书中提出,后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Granovetter 推动发展。Granovetter^[24]批判了社会化不足和社会化过度两种观点,认为现实中个体的行为既不会脱离社会背景,也不会完全受社会外在规范限制,而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即个人的行为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嵌入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24-25]。乡村旅游因其综合性、广域性、联动性等特性打破乡村治理边界,助推乡村社会网络重构,进而影响嵌入其中的治理参与行为。因此,本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遵循“发展乡村旅游—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进一步聚焦于乡村亲缘网络、地缘网络、业缘网络,系统分析旅游发展背景下三缘网络在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发生的重构,探讨三缘网络的重构对旅游乡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为理解乡村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影响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研究假设

社会网络是行动者(节点)和行动者之间关系的集合^[26]。传统研究范式关注行动者的个体属性如何决定其行为,社会网络范式则认为行动者所在网络的结构、所处的位置、社会关系等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27]。费孝通^[18]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指乡村社会网络呈现以己为中心,依据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逐级向外扩散的“差序格局”状。李秋成等^[28]在研究乡

村旅游小企业的成长时考虑亲缘网络和产业网络对其的影响。李汉宗^[29]在研究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后的社会关系转变时从连接纽带入手将社会关系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因此,本文将村民的社会网络分为亲缘网络(包括血缘)、地缘网络、业缘网络。基于社会嵌入理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分别指个体行为嵌入在网络结构和关系纽带中,即村民所在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强度会影响村民的行为。发展乡村旅游导致乡村社会网络发生重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势必受到影响。下面进一步分析旅游发展如何重构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结构和关系,进而如何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1.1 亲缘网络重构和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亲缘网络是村民基于血缘和婚姻而形成的个人关系网络,村民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亲属是该网络中的成员^[30]。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化加快了农村空心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乡村以亲缘关系为核心、家族或宗族聚集扎根的居住空间格局被打破^[1]。发展乡村旅游一方面有利于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减缓人口外流趋势^[31];另一方面吸引众多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参与乡村旅游事业发展^[32],乡村亲缘网络结构发生重构。乡村亲缘之间的地理距离缩短,亲缘网络一度缺失的角色补位,使得淡化的亲缘关系得以修复,亲人之间的互动频率、亲密程度等随之上升,亲缘网络关系发生重构。根据社会嵌入理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嵌入在亲缘网络的结构和关系中,村民亲缘网络的规模扩大,异质性提升,亲缘间互动和互惠频率提高,则村民更容易获取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信息和资源;同时,亲缘网络的重构有助于乡村集体惩罚机制的建立,保证参与者行为的可预期性

和承诺的可靠性,有效减少“搭便车”现象,促使网络中更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已有研究发现,家庭是基层社会的黏合机制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承担着某种动员居民自治、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作用^[33];乡村宗族网络规模正向影响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34]。基于上述分析和已有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a:发展旅游后,乡村亲缘网络结构发生重构。

H1b:发展旅游后,乡村亲缘网络关系发生重构。

H2a:亲缘网络结构嵌入正向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H2b:亲缘网络关系嵌入正向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1.2 地缘网络重构和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地缘网络指基于地理位置和空间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其成员包括邻居、同村的朋友、同学和熟人等,地缘网络涉及村民之间的交往、资源共享、信息交流等方面,是乡村社区发展和治理的重要基础。发展乡村旅游后,乡村空心化现象得到有效缓解,一方面,吸引人才回流,部分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工作,重新回到乡村生活;另一方面,一批大学毕业生、科技人员、艺术家和企业家等外来人才也积极入乡创业,成为“新村民”。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充分激发乡村活力,地缘网络结构发生重构^[35]。返乡入乡群体引入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生产生活理念,村民从地缘网络中获取的信息数量和质量大大提升,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增强。发展旅游不仅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也提高了村民的素质,邻里交往间更加礼貌,同时,旅游发展使乡村公共活动增加,为村民交往提供更多平台,乡村地缘网络关系发生重构^[36]。村民之间的连接被强化,乡村“出走”的集体意识、公共意识回归,乡村共同体重新构建,只要有村民积极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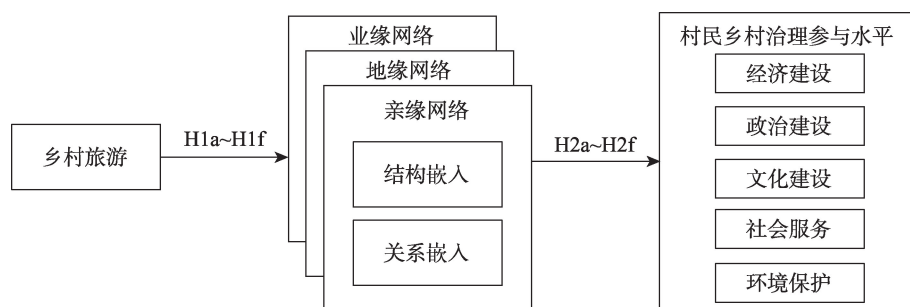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旅游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研究模型

Fig.1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rural tourism affect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level in rural governance

乡村治理,其行为会通过网络连接影响其他村民,成为其他村民的恰当行为向导。已有研究表明,本地村民愿意和“新村民”交往,也乐于接受“新村民”带来的先进发展理念,参与乡村共建共治共享^[37];有一定公共责任意识的村民会主动参与乡村治理,且能够发挥典型示范与带动作用^[38]。基于上述分析和已有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c:发展旅游后,乡村地缘网络结构发生重构。

H1d:发展旅游后,乡村地缘网络关系发生重构。

H2c:地缘网络结构嵌入正向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H2d:地缘网络关系嵌入正向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1.3 业缘网络重构与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业缘网络指因职业活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同事、上级、下属、生意伙伴等属于业缘网络内的关系^[29]。传统村落的村民往往对农业过度依赖,生计策略选择单一,村民的业缘网络规模小,异质性极低,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冗余信息,村民个体及家庭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同时制约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乡村旅游作为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有效方式^[39],使得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旅游业等多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产业联动”效应^[40],为村民提供多样化的生计选择,也吸引外来资本、人才来到乡村,业缘网络结构发生重构。相比亲缘和地缘关系,业缘网络中的资源多样性更强、异质性更高,并且与村民的经济收入息息相关,“腰包鼓腰杆就硬”,村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其公共事务参与行为^[41]。村民作为主人翁参与乡村事业发展,扩展或重建相互连接的业缘网络,网络中的村民以契约维持稳定关系,业务往来增强彼此间的连接强度,业缘网络关系发生重构。关系强度越大,村民讨论参与乡村治理的频率越高,越便于完成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信

息共享;同时,业缘网络关系质量提高,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增强个体间凝聚力,进而形成合作和监督机制^[4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e:发展旅游后,乡村业缘网络结构发生重构。

H1f:发展旅游后,乡村业缘网络关系发生重构。

H2e:业缘网络结构嵌入正向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H2f:业缘网络关系嵌入正向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2 研究设计、研究区域及变量测度

2.1 研究设计

本文遵循“发展乡村旅游—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通过两个递进的研究进行实证检验(表1)。具体来说,研究一设置实验组(发展乡村旅游的乡村)和控制组(没有发展乡村旅游的乡村),形成“前后”对比和“有无”对比,系统评估乡村旅游是否以及如何重构乡村的社会网络。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通过建立 Poisson 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对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并探索影响的异质性。

2.2 研究区概况

根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乡村旅游地会经历开发、起步、发展、稳固、停滞、衰落或复兴等6个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参考已有研究^[43-45],可认为当乡村旅游地处于稳固、停滞或复兴阶段时,才会形成较为成熟的旅游市场,旅游才能够对村民的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所研究的乡村旅游地为旅游发展已处于稳固、停滞或复兴阶段,多数村民能从旅游发展中直接或间接受益的乡村,研究对象为年满18岁、出生于本村或因婚嫁关系来到本村、近一年内居住于本村的村民。实地考察

表1 研究设计
Tab.1 Research design

比较项目	研究一:乡村旅游对乡村社会网络的影响	研究二:乡村社会网络对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
研究目的	检验假说H1a~H1f	检验假说H2a~H2f
研究方法	实验法	Poisson回归
研究区	忠良村、上灵村	忠良村
解释变量	实验控制(是否发展旅游)	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
被解释变量	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	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研究结果	支持假说H1a~H1f	支持假说H2a~H2f

察后,选取旅游发展已处于稳固阶段的南宁市忠良村作为主要案例地,上灵村作为研究一中用于对比的案例地。忠良村隶属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石埠街道,总面积约4 km²,辖5个生产队,共561户2117人,曾长期以蔬菜种植为村内主要产业。曾经的忠良村人均土地少,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劳动力外流严重。2005年开始,忠良村把握发展趋势,主动求新求变,基于区位和交通优势,重点发展乡村旅游。2013年后,广西胤龙生态农业公司、洛克玫瑰庄园、无为谷葡萄采摘园、紫薇庄园等企业先后进驻忠良村。经过不断学习、摸索和建设,2015年,忠良村正式对外开放旅游。从此忠良村顺应时代大潮,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从发展农家乐逐步拓展到全力推进“美丽南方”田园综合体建设,先后获得“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村”等荣誉。上灵村同样为南宁市西乡塘区石埠街道管辖的一个行政村,两村相距4.7 km。上灵村面积约4 km²,辖10个生产队,共有442户1772人,现有耕地720亩,鱼塘65亩。同发展乡村旅游前的忠良村一样,上灵村以蔬菜种植为村内主要产业。上灵村村民的生计策略始终以在村务农和外出务工为主,未发展乡村旅游。

2.3 变量测度

2.3.1 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是指村民参与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元素的全面治理,从而实现乡村有序发展^[46-47]。参考已有研究^[38,48],具体包括村民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服务和环境保护5个领域的参与水平(表2)。其中,经济建设参与行为包括分享经营经验、向村委提供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建议、加入本村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本村组织的技能培训、参与农家乐厨艺比拼大赛等,有过1种及以上行为则视为参与本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参与行为包括作为选举人或被选举人参与村委的选举活动、参加村民大会、对村务工作进行监督(如经常关注公开栏的信息)、向有关部门反应问题等;文化建设参与行为包括参加丰收节、田园马拉松等民俗文化活动,向农民书屋捐赠书籍,参与本村科普教育活动等;社会服务参与行为包括主动帮助本村困难群众,主动关心本村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成为乡村志愿者等;环境保护参与行为包括为本村环境整治建言献策、经常主动维护乡村环境卫生、主

动参与生态修复和治理的各项活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等。

2.3.2 结构嵌入、关系嵌入

参考已有研究^[30-49,50],结构嵌入采用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与网络位置进行度量(表2),以亲缘网络为例,分别用“常住在村里的家人亲戚的人数”“在村里的家人亲戚的生计策略种类数”“在网络中拥有话语权”来表征;关系嵌入采用互动强度、信息共享与信任强度进行度量,以亲缘网络为例,分别用“与村里的家人亲戚的交流频率”“是否与村里的家人亲戚讨论和本村相关的消息”“遇到困难时是否会向村里的家人亲戚求助”来表征。

3 乡村旅游对乡村社会网络的影响

本部分采用实验法检验发展旅游是否以及如何重构乡村的亲缘—地缘—业缘网络,并选取忠良村为实验组,上灵村为控制组。

3.1 数据收集及处理

调研组于2023年6月前往忠良村和上灵村开展田野调查。通过对村干部进行深入访谈以了解乡村基本概况以及2013—2023年间乡村社会变化情况,通过入户发放调查问卷以获取2013年和2023年两村村民社会网络的结构和关系数据。本次调研将2013年以前就居住在本村的常住人口作为总体,采用分层抽样法确定样本。忠良村辖5个生产队,从每个生产队随机抽取12户符合调研要求的村民进行问卷调查。上灵村辖10个生产队,从每个生产队随机抽取6户符合调研要求的村民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剔除部分核心数据缺失或数据前后矛盾的问卷,调研组在忠良村和上灵村分别获得有效问卷51份和48份。两个村庄的受访人员男女比例大体相当,40岁以上居民占多数,受教育程度偏低,以中学及以下学历居多,忠良村、上灵村受访村民个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分别占68.63%和91.67%(表3)。

本部分有两个案例地:实验组和控制组,两期数据:2013年(实验组旅游开发前)和2023年(实验组旅游开发后),共获得4组数据:实验组2023年、实验组2013年、控制组2023年、控制组2013年,运用软件SPSS处理数据。

3.2 结果分析

图2为实验组与控制组社会网络对比差距图。

表2 核心变量测量

Tab.2 Measurement of key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村民参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服务、环境保护等乡村治理活动的数量(0=未参与;1=参与1种;2=参与2种;3=参与3种;4=参与4种;5=参与5种)
亲缘网络结构嵌入	
规模(KNS)	常住在村里的家人亲戚的人数(1=0~5人;2=6~10人;3=11~15人;4=16~20人;5=20人以上)
异质性(KNH)	在村里的家人亲戚的生计策略种类数(1=1种;2=2种;3=3种;4=4种;5=5种及以上)
位置(KNL)	在网络中拥有话语权(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
亲缘网络关系嵌入	
互动强度(KNE)	与村里的家人亲戚的交流频率(1=几乎不;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经常)
信息共享(KNI)	是否与村里的家人亲戚讨论和本村相关的消息(1=几乎不;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经常)
信任强度(KNT)	遇到困难时是否会向村里的家人亲戚求助(1=几乎不;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经常)
地缘网络结构嵌入	
规模(GNS)	常住在村里的熟人朋友的人数(1=0~10人;2=11~20人;3=21~30人;4=31~40人;5=40人以上)
异质性(GNH)	在村里的熟人朋友的生计选择种类数(1=1种;2=2种;3=3种;4=4种;5=5种及以上)
位置(GNL)	在网络中拥有话语权(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
地缘网络关系嵌入	
互动强度(GNE)	与村里的熟人朋友的交流频率(1=几乎不;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经常)
信息共享(GNI)	是否与村里的熟人朋友讨论和本村相关的消息(1=几乎不;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经常)
信任强度(GNT)	遇到困难时是否会向村里的熟人朋友求助(1=几乎不;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经常)
业缘网络结构嵌入	
规模(CNS)	村里和您发生业务往来的人数(1=0~5人;2=6~10人;3=11~15人;4=16~20人;5=20人以上)
异质性(CNH)	村里和您发生业务往来的人的生计选择种类数(1=1种;2=2种;3=3种;4=4种;5=5种及以上)
位置(CNL)	在网络中拥有话语权(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
业缘网络关系嵌入	
互动强度(CNE)	与村里和您发生业务往来的人的交流频率(1=几乎不;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经常)
信息共享(CNI)	是否与村里和您发生业务往来的人讨论和本村相关的消息(1=几乎不;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经常)
信任强度(CNT)	遇到困难时是否会向村里和您发生业务往来的人求助(1=几乎不;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经常)

表3 忠良村和上灵村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研究一)

Tab.3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of Zhongliang and Shangling villages (Part One) (人)

变量	类别	忠良村	上灵村	变量	类别	忠良村	上灵村
性别	男	28	22	年龄	40~49岁	14	7
	女	23	26		50~59岁	12	15
学历	小学及以下	10	16	月收入	60岁及以上	14	19
	初中	18	14		2000元以下	15	25
	高中、中专	15	13		2000~3000元	20	19
	大专	6	5		3001~4000元	10	4
	本科及以上	2	0		4001~5000元	5	0
年龄	18~29岁	3	2		5001~6000元	1	0
	30~39岁	8	5				

2013年,忠良村和上灵村的社会网络概况相差不大,进一步证明控制组选取的合理性。2013年,两村村民的亲缘网络规模均值都在11~15人,地缘网络规模均值在21~30人,村民的生计策略均为务农

和外出务工两类,多数村民在亲缘网络和地缘网络中处于即非中心也非边缘的位置,与亲属、朋友的交流频率一般,且较少讨论与本村相关的消息,忠良村村民对亲属的信任程度略高于上灵村村民,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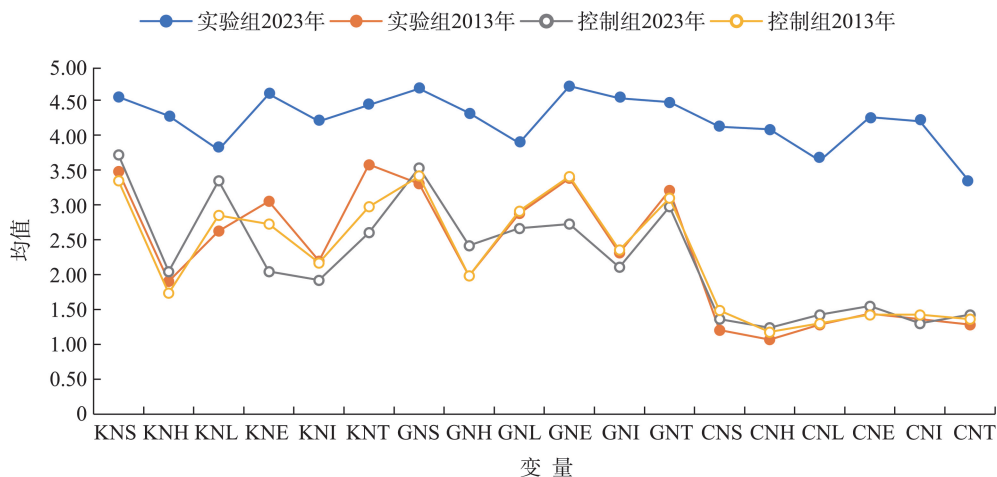


图2 实验组与控制组社会网络对比差距

Fig.2 Gaps between the social networks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村村民在本村几乎没有建立起业缘网络。

同2013年相比,2023年的上灵村各变量没有发生较为明显的提升,甚至亲缘网络和地缘网络的关系嵌入相关变量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在与村干部、村民的访谈中得知,10年间选择外出务工的村民数量逐渐增加。由于上灵村距南宁市区仅18 km,选择外出务工的村民中大部分村民白天在南宁市区务工,晚上回到村里休息,这就导致即使是同住在一栋楼房里的亲属,或是比邻而居的熟人,几乎没有碰面交流的时间,也很少谈论和本村相关的事。交流互动问题在访谈中被上灵村村民多次提及:“白天大家都在城里打工,下班的时间都不一样,吃饭都碰不到一起,哪里有时间聊天”(SL3)。“我家的田都租出去了,没什么村里的事要交流”(SL10)。“我们家里都是早出晚归的,我跟我父母的房子离得很近,都两三天没见到了”(SL19)。上灵村村民的主要生计策略仍是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村民之间几乎没有业务往来,没有在本村建立起业缘网络。2023年,同10年前相比,发展旅游的忠良村各个变量均值都出现显著提升。随着发展旅游后村内工作岗位的增多和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常住忠良村的人口持续增加。忠良村村民的亲缘、业缘网络规模均值在16~20人,地缘网络规模均值在31~40人。村委工作人员提到:“以前穷的时候,别人都不愿意嫁到我们村,发展旅游以后嫁到我们村来的都更多了”(ZL1)。亲属、朋友的生计策略种类数的均值增加到4~5种,除务农和外出务工外,村民可以选择参与乡村旅游经营,

如开农家乐、开餐馆、到当地旅游企业务工等,因此,选择在村内就业的村民逐渐发展出业缘网络。据村委介绍,忠良村现有17家农家乐、4家民宿、3家特色农业园、1家艺术庄园以及若干小商铺,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吸引了外来企业家、艺术家等入乡创业生活。正如受访村民所提及:“以前除了干农活就是干农活,要不就是去外面打工,现在在我家门口就能工作,选择多多了”(ZL7)。“以前我们种地只和农民打交道,现在我们种的菜还能卖给村里的农家乐”(ZL22)。“很多外地人来玩来我们这开店,我们眼界都开阔多了”(ZL23)。“外面的企业来我们这搞葡萄园,搞草莓园,我就在那里做工。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去外面都找不到工作的,在村里做工我还可以照顾孙子”(ZL44)。村民在网络中的位置均值均增大,可能是因为部分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在网络中的中心度较10年前得到较大提升。一位在农家乐做服务员工作的女性村民强调:“以前在村里我们女人是没有发言权的,现在我自己也在村子里工作,自己挣钱,学到的东西多了,现在我们女人也可以说上话了”(ZL42)。随着旅游发展,村民与村民之间产生的连接增多,交流频率明显提高,同时,为服务旅游经济,忠良村经常举办“农民丰收节”“田园马拉松”等民俗文化活动,为村民互动提供更多平台。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更加关心乡村发展,在日常交流中时常谈论与本村相关的事务,村民之间共享信息程度提升。乡村社会原子化现象扭转,人际信任回归,互助协作意愿明显增强。受访村民提到:“以前就门前门后大家几

个媳妇聊孩子,现在交通方便,眼界开阔了,村里经常搞活动,能认识好多朋友”(ZL15)。“以前无聊,好多人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架,吵很凶,现在少多了”(ZL47)。一位超市店主提到:“大家经常来我店里聊天,以前在外面打工,也就过年的时候回来一趟”(ZL30)。

将实验组 2023 与实验组 2013 的社会网络差值、控制组 2023 与控制组 2013 的社会网络差值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实验组 10 年间社会网络的变化值均显著大于控制组 10 年间社会网络的变化值。

数据结果说明,发展旅游使得乡村的亲缘—地缘—业缘网络发生重构,假说 H1a、H1b、H1c、H1d、H1e、H1f 得到验证。

4 旅游乡村社会网络对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

4.1 模型设定

本节旨在进一步检验旅游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对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核心被解释变量“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是一个计数

型数据,采用 Poisson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对于个体 *i*,被解释变量 $Y=y_i$ 的概率由参数为 λ_i 的 Poisson 分布决定:

$$P(Y_i=y_i|x_i)=\frac{e^{-\lambda_i}\lambda_i^{y_i}}{y_i!} \quad (y_i=0,1,2,\cdots) \quad (1)$$

式中: $\lambda_i>0$ 为“Poisson 到达率”,表示事件发生的平均次数由解释变量 x_i 决定。Poisson 分布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均值与方差相等,且均等于 λ_i ,即:

$$E(Y_i|x_i)=\text{Var}(Y_i|x_i)=\lambda_i \quad (2)$$

为保证 λ_i 非负,对式(1)进行转换。Poisson 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ln \lambda_i = \sum_{k=1}^K \beta_k x_{ik} \Rightarrow \lambda_i = \exp\left(\sum_{k=1}^K \beta_k x_{ik}\right) \quad (3)$$

式中: β_k 为系数; x_{ik} 为解释变量; $\exp\left(\sum_{k=1}^K \beta_k x_{ik}\right)$ 为发生率比(IRR),表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当解释变量 x_{ik} 增加一个单位,被解释变量的平均发生次数增加的倍数。

4.2 数据收集及处理

调研组于 2023 年 9 月前往忠良村开展入户问卷调查。忠良村辖 5 个生产队,在村干部的协助下,从每个生产队随机抽取 60 户村民进行入户调查,最

表 4 实验组与控制组 10 年间社会网络变化值 *T* 检验结果

Tab.4 *T*-test results of social network change valu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over 10 years

变量	平均值±标准差		<i>t</i>	<i>P</i>	Cohen's <i>d</i>
	控制组(<i>n</i> =48)	实验组(<i>n</i> =51)			
KNS	0.38±0.87	1.08±0.80	-4.211	<0.001	0.847
KNH	0.31±0.59	2.39±0.80	-14.764	<0.001	2.942
KNL	0.50±0.51	1.18±0.84	-4.881	<0.001	0.968
KNE	-0.69±0.99	1.55±0.99	-11.241	<0.001	2.261
KNI	-0.25±0.67	2.02±0.73	-16.047	<0.001	3.227
KNT	-0.38±0.70	0.86±0.75	-8.464	<0.001	1.702
GNS	0.13±0.79	1.37±0.82	-7.687	<0.001	1.546
GNH	0.44±0.50	2.35±0.72	-15.489	<0.001	3.082
GNL	-0.25±0.67	1.02±0.65	-9.597	<0.001	1.93
GNE	-0.69±0.59	1.33±1.01	-12.217	<0.001	2.42
GNI	-0.25±0.67	2.24±0.84	-16.24	<0.001	3.266
GNT	-0.13±0.94	1.27±0.90	-7.597	<0.001	1.528
CNS	-0.13±0.61	2.94±1.38	-14.481	<0.001	2.853
CNH	0.06±0.43	3.04±1.26	-15.855	<0.001	3.112
CNL	0.13±0.79	2.37±1.25	-10.773	<0.001	2.138
CNE	0.13±0.70	2.84±1.08	-14.886	<0.001	2.956
CNI	-0.13±0.33	2.86±1.17	-17.542	<0.001	3.437
CNT	0.06±0.43	2.06±0.86	-14.738	<0.001	2.91

终共收回有效问卷271份。受访人员男女比例大体相当,中老年村民居多,受教育程度偏低,个人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的村民占67.90%,49.08%的村民参与旅游经营与服务(表5)。使用软件StataMP 17处理数据。

4.3 结果分析

4.3.1 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基本情况

总体来看,忠良村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均值为2.85,从未参与过乡村治理的村民占12.55%,有过1、2、3、4、5种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村民分别占14.02%、13.65%、19.19%、16.97%、23.62%。就乡村治理活动类型而言,73.43%的村民参与过乡村文化建设,其次69.74%的村民参与过环境保护,参与过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服务的村民分别占68.27%、43.17%、30.26%。

4.3.2 社会网络对村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

采用Poisson回归模型估计社会网络对村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利用前进法和逐步筛选法两种方法,共构建6个模型(表6)。模型1至模型5采用前进法构建,其中,模型1至模型3反映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独立效应,即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仅将亲缘网络结构和关系嵌入、地缘网络结构和关系嵌入、业缘网络结构和关系嵌入作为解释变量;模型4是包含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结构和关系嵌入的模型;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模型6采用逐步筛选法构建,考虑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模型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至模型5的调整后的 R^2 分别为0.202、0.196、0.221、0.249、0.253,说明三缘网络变量的组合解释

力强于单一网络变量,加入控制变量后更优。剔除掉不显著的变量后,模型6的调整后的 R^2 为0.253,与模型5一致。

模型6与模型5相比,剔除了不显著的性别变量和学历变量。以往关于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传统乡村中男性村民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较多,而在本研究中,性别和学历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说明发展乡村旅游提升了女性村民和低学历村民的治理参与水平。由于模型6为引入控制变量后共同纳入三缘网络变量的模型,且剔除了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其结果更科学、更严谨,因此,下文分析以模型6的回归结果为主展开。模型6的估计结果显示,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提升均能显著促进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亲缘网络结构嵌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提升6.7%;亲缘网络关系嵌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提升12.3%;地缘网络结构嵌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提升22.4%;地缘网络关系嵌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提升8.0%;业缘网络结构嵌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提升8.7%;业缘网络关系嵌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提升8.3%。因此,假说H2a、H2b、H2c、H2d、H2e、H2f均通过验证。控制变量中,年龄与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呈倒“U”形关系,即年龄对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这与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月收入显著正向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表5 忠良村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研究二)
Tab.5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of Zhongliang Village (Part Two) (人)

变量	类别	人数	变量	类别	人数
性别	男	137	年龄	18~29岁	13
	女	134		30~39岁	34
学历	小学及以下	73		40~49岁	77
	初中	75		50~59岁	73
	高中、中专	86	月收入	60岁及以上	74
	大专	26		2000元以下	88
	本科及以上	11		2000~3000元	96
是否参与旅游经营与服务	是	133		3001~4000元	50
	否	138		4001~5000元	23
				5001~6000元	9
				6000元以上	9

表6 社会网络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回归结果

Tab.6 Regression results of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affecting residents'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解释变量						
亲缘网络结构嵌入	1.184***	—	—	1.079***	1.075**	1.067**
亲缘网络关系嵌入	1.516***	—	—	1.114***	1.115***	1.123***
地缘网络结构嵌入	—	1.692***	—	1.229***	1.233***	1.224***
地缘网络关系嵌入	—	1.193***	—	1.075***	1.079***	1.080***
业缘网络结构嵌入	—	—	1.142***	1.108***	1.088***	1.087***
业缘网络关系嵌入	—	—	1.336***	1.118***	1.079**	1.083**
控制变量						
性别	—	—	—	—	0.961	—
学历	—	—	—	—	0.996	—
年龄	—	—	—	—	1.153*	1.181**
年龄的平方	—	—	—	—	0.969**	0.966***
月收入	—	—	—	—	1.047***	1.043***
常数项	0.331***	0.178***	0.683***	0.233***	0.233***	0.224***
调整后R ²	0.202	0.196	0.221	0.249	0.253	0.253

注:表中数据除“调整后R²”一行外,均为发生率比(IRR);*、**、***分别表示P<0.1、P<0.05、P<0.01。下同。

4.3.3 社会网络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异质性分析

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和未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在生计水平、人际交往、信息获取等方面存在差异。参与旅游经营有助于提高村民的可持续生计水平,使其与本村及外界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均有了更深入的接触,村民的个人发展嵌入在乡村的整体发展中,促使村民关注本村的公共事务和政策制度^[51]。因此,社会网络可能对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和未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产生异质性影响。

整体来看,参与旅游经营村民和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均值分别为3.97和1.77。可以看出,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村民其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程度明显高于未参与旅游发展的村民。

模型7和模型8分别为参与旅游经营村民和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估计结果,均采用逐步筛选策略,剔除掉不显著变量(表7)。可见,对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而言,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业缘网络关系嵌入、地缘网络结构嵌入、业缘网络结构嵌入、亲缘网络关系嵌入、地缘网络关系嵌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均次数分别会提升16.3%、12.3%、9.8%、5.0%、4.9%;对未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而言,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地缘网络结构嵌入、亲缘网络关系嵌入、亲缘网络结构嵌

表7 社会网络对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异质性影响

Tab.7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residents'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变量	模型7 参与旅游经营	模型8 未参与旅游经营
解释变量		
亲缘网络结构嵌入	—	1.201***
亲缘网络关系嵌入	1.050**	1.257**
地缘网络结构嵌入	1.123***	1.372***
地缘网络关系嵌入	1.049**	—
业缘网络结构嵌入	1.098***	—
业缘网络关系嵌入	1.163***	—
控制变量		
性别	—	—
学历	—	—
年龄	1.198**	—
年龄的平方	0.968**	—
月收入	—	—
常数项	0.466***	0.073***
调整后R ²	0.084	0.265

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均次数分别会提升37.2%、25.7%、20.1%。说明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业缘网络和地缘网络的促进效应较大,未参与旅游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水平则主要受亲缘网络和地缘网络影响。

4.3.4 社会网络对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社会网络对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机制,对部分村民进行了深入访谈,总结出以下4种影响渠道:

(1) 信息获取。村民能从网络共享的信息库中获取信息,个体社会网络的广度与规模越大,越靠近网络中心,获取信息的速度就越快,信息的异质性就越高,同时,较强的信任与情感纽带也能显著提高村民的信息分享意愿。拥有更准确多样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的村民,其社会学习的可能性大大提升,更有助于克服对参与乡村治理的认知缺陷,能够在参与过程中占据明显的信息优势。一位村民提到:“以前就种种地带带孩子,生活很无聊的,现在接触的人多了,眼界都开阔了,大家都愿意去学新东西”(ZL60)。一位小吃店店主提到:“我加入了我们村的经联社,我们这些店都加入了,经常会搞一些技能培训,大家互相多交流交流经验,上面有什么政策也会很快通知我们”(ZL83)。

(2) 集体监督。在社会网络中,如果多数村民都履行治理参与行为,那么“集体惩罚机制”或“社会隔离机制”会对那些未履行治理参与行为的村民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促使他们参与乡村治理。受访村民提到:“以前我们村里大家都没有什么环保意识,扔了就扔了,现在大人都知道教育小孩子不要乱扔垃圾,你乱扔你自己都不好意思的”(ZL67)。

(3) 榜样引导。村民会将社会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村民或是拥有一定资源的村民赋予权威性,并作为自己恰当行为的榜样。共同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使行为向导更容易产生并对其行为信息做出解释和评价,进而成为村民形成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指引和示范。正如受访村民所提及:“人家从外面到我们村里来做生意的老板都很厉害,素质很高的,村里搞什么活动他们都会去参加,也给我们村里提了很多有用的建议,我们要向他们学习”(ZL71)。“我爸爸以前是村干部,现在年纪大了,但是村里有什么事的话他是很热心的,村里人都很尊重他。所以村里有活动或者需要我们参加什么,我们家里都是很积极的”(ZL95)。

(4) 共同体意识。规模大、异质性高的强关系网络让村民产生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对所生活的乡村形成情感归属和地方认同,将自身利益和发展同乡村整体的利益和发展深度绑定。如村民所提到:

“我哥哥现在在村委工作,我自己也开店,家里好多人也是在村子里开店啊做工啊,我们肯定是支持村子搞的这些工作的,要去参加什么活动都是很积极很配合的,把村子发展好了我们大家才能好”(ZL80)。

5 结论、建议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通过两个递进的实证研究,从社会网络重构视角研究旅游与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间的关系,验证了发展乡村旅游通过重构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结构和关系进而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并证明了社会网络对参与旅游经营村民和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产生异质性影响(图3)。具体而言:

(1) 对比实验组和控制组发现,发展乡村旅游使得乡村的亲缘—地缘—业缘网络在结构和关系维度发生重构。网络结构方面,发展乡村旅游扩大了网络规模,提高了网络异质性,提升了部分村民在网络中的中心度;网络关系方面,发展乡村旅游增强了村民间的交流频率、信任强度,促进信息共享。

(2) 旅游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均能显著正向影响村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按照发生率比,村民的地缘网络结构嵌入、亲缘网络关系嵌入、业缘网络结构嵌入、业缘网络关系嵌入、地缘网络关系嵌入、亲缘网络结构嵌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均次数分别会提升22.4%、12.3%、8.7%、8.3%、8.0%、6.7%。社会网络主要从信息获取、集体监督、榜样引导、共同体意识4个方面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

(3) 社会网络对参与旅游经营村民和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产生异质性影响。业缘网络关系嵌入、业缘网络结构嵌入和地缘网络结构嵌入对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促进效应较强,地缘网络结构嵌入、亲缘网络关系嵌入和亲缘网络结构嵌入对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影响作用较强。

(4) 总体来看,忠良村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就参与治理活动类型而言,呈现出“文化建设参与>环境保护参与>政治建设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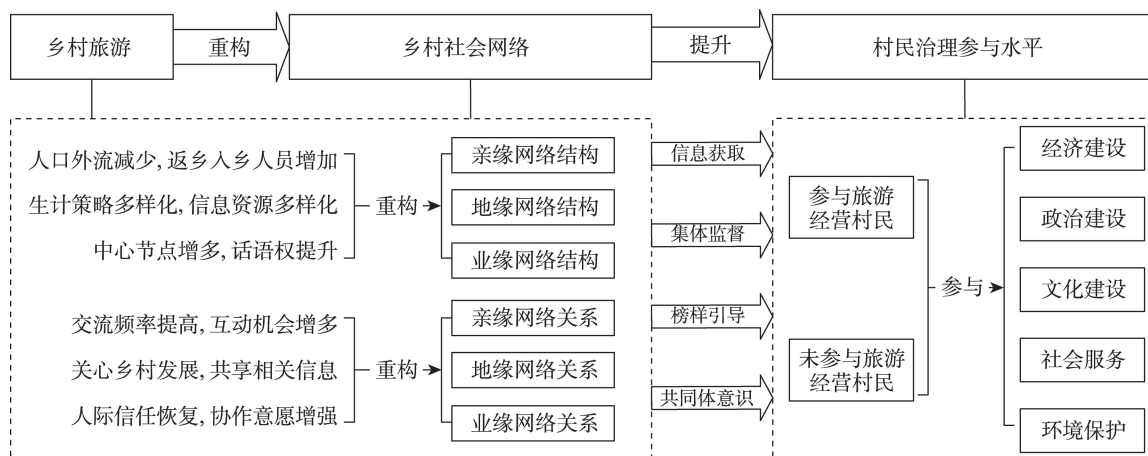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Fig.3 Paths of tourism promot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reconstruction

5.2 建议

(1) 重视乡村人口的“留”与“流”，以旅游发展重构乡村居民主体。乡村空心化和乡村居民老龄化日益严重，带来乡村出现家庭结构长期不完整、村集体组织空心化运转等社会生态失衡问题和选举参与率低、基层组织体系涣散等基层治理难题。重构乡村居民主体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举措，关键在于乡村原住民的“留”下和返乡入乡群体的“流”入，走好乡村振兴战略。一是要丰富乡村旅游产业元素和内容，推动数字技术、艺术乡建等赋能乡村旅游，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原住民就地就业和就地创业，同时增设乡村旅游公益性岗位，帮助乡村弱势群体在旅游发展中受益，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二是要建构起完善的人才入乡返乡激励机制，包括财政奖补等激励政策和保障激励政策执行落实的监督机制，切实保证人才入乡返乡的利益吸引力，同时营造良好生活环境和营商环境，健全城乡一体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让入乡返乡人才无后顾之忧扎根乡村、治理乡村。

(2) 为加强乡村社会关系提供多样化平台，以旅游发展重构乡村共同体。针对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业缘网络嵌入程度对其乡村治理参与水平起重要作用。分散化经营导致村民原子化趋势显著，应着力构建乡村经济利益共同体，最大限度调动乡村旅游从业者参与合作经济的积极性。首先要大力培育和发展乡村旅游组织，如农家乐协会、休闲旅游合作社、村集体旅游服务公司等；其次要借助数字技术构建现代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商业合作平台，协助乡村旅游从业者间建立广泛连

接，拓展和加强业缘网络。对全体村民而言，亲缘和地缘仍是维系乡村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纽带，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也是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号召的积极响应。一是要铸牢村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意识；二是要围绕乡村旅游建设乡村公共空间，积极开展乡村集体活动，引导村民良性参与，以强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和产生新的社会关系；三是要发挥基层组织引领协调作用，合理规划旅游发展收益格局，鼓励村民参与本村旅游事业的同时提升村民的参与能力，尽可能使村民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最大限度减少村民的相对剥夺感，构建平等相处、互利互惠的社会风气。

(3) 以文化治理为契机，带动参与其他乡村治理活动。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治理活动的积极性较高，同时优秀的乡村文化能够起到凝心聚力的引领作用。因此，一是要继续加强村民的文化治理参与积极性，形成具有地方基因的乡村集体记忆，强化村民的文化认同和集体认同，构筑和谐社会风气；二是要以参与乡村文化生态建设为契机，将文化治理与其他乡村治理活动有机结合，引导村民不断提升乡村治理参与水平。

5.3 讨论

目前学界在探讨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体框架下，认为旅游在乡村整体层面可以提高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水平^[10]和号召力^[13]，在村民个体层面可以为村民带来经济利益、公共资源^[14,16]，同时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15]、公民意识^[17]，进而影响村民的参与行为。但现有文献尚未关注到乡村社会网络

在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且缺乏理论模型的支撑。相较于既有文献,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从社会网络重构的视角切入,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揭示了乡村旅游如何重构乡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进而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和路径,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上都进行了补充和拓展,并为相关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丰富了乡村旅游与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助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本文仅选取了广西地区的乡村作为案例地,研究结论欠缺一定的推广性;二是研究中实验组和控制组10年前的数据是由村民依据记忆填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三是研究中仅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和未参与旅游经营的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还可按照其他标准划分村民群体以检验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以上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补充与深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刘彦随, 刘玉. 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10, 29(1): 35-42. [Liu Yansui, Liu Yu. 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the study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 35-42.]
- [2] 黄博琛. 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出路[J]. 农业经济, 2022(1): 83-85. [Huang Bochen. Dilemma and outlet of rural governance.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1): 83-85.]
- [3] 赵普兵. 协商治理: 农村自治转型之路[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122-129. [Zhao Pubing. Consultation governance: The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18(2): 122-129.]
- [4] 贺雪峰. 乡村治理40年[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57(6): 14-16. [He Xuefeng. Forty years of rur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57(6): 14-16.]
- [5] 文雷, 王欣乐.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智慧治理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0(2): 72-81. [Wen Lei, Wang Xinyue. The 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a rural smart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50(2): 72-81.]
- [6] 李裕瑞, 常贵蒋, 曹丽哲, 等. 论乡村能人与乡村发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0): 1632-1642. [Li Yurui, Chang Guijiang, Cao Lizhe, et al. Rural elite an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10): 1632-1642.]
- [7] 马华. 村治实验: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样态及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5): 136-159, 207. [Ma Hua. The village governance experiment: The developmental pattern and logic of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8(5): 136-159, 207.]
- [8] 于健慧. 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 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分析[J]. 理论探讨, 2021(4): 91-96. [Yu Jianhui.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farmers (villager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governa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stakeholders'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2021(4): 91-96.]
- [9] 孙九霞, 王学基. 城乡循环修复: 乡村旅游建构新型城乡关系的框架与议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1): 25-32. [Sun Jiuxia, Wang Xueji. Urban-rural cycle restoration: The framework and issues for rural tourism to construct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42(1): 25-32.]
- [10] 陆林, 任以胜, 朱道才, 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19, 38(1): 102-118. [Lu Lin, Ren Yisheng, Zhu Daocai, et al.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sp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02-118.]
- [11]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J].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 [12] 马瑛, 吴冰, 贾榕榕.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研究: 以太原市王吴村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2): 124-131. [Ma Ying, Wu Bing, Jia Rongrong.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Take Wang Wucun of Taiyuan as an example.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1, 42(12): 124-131.]
- [13] 周巍. 乡村旅游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以惠州市霞角村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20(3): 94-99. [Zhou Wei.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o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Take Xiajiao Village of Huizhou City as an example. Social Scientist, 2020(3): 94-99.]
- [14] 周国忠, 姚海琴. 旅游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以浙江顾渚等四个典型村为例[J]. 浙江学刊, 2019(6): 133-139. [Zhou Guozhong, Yao Haiq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four typical villages such as Guzhu in Zhejiang Province.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19(6): 133-139.]

- [15] 向延平. 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动力机制研究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1(2): 41-47. [Xiang Yanping.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rural tourism-drive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Hunan, 2021(2): 41-47.]
- [16] 蔡克信, 杨红, 马作珍莫. 乡村旅游: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路径选择 [J]. 农村经济, 2018(9): 22-27. [Cai Kexin, Yang Hong, Ma Zuozhenmo. Rural tourism: A path choice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conomy, 2018(9): 22-27.]
- [17] 郭凌.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乡村治理研究 [J]. 农村经济, 2008(6): 75-77. [Guo Ling. Study on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Rural Economy, 2008 (6): 75-77.]
- [18]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1. [Fei Xiaotong. Fertility system in rural China.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51.]
- [19] 贺雪峰. 论半熟人社会: 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 [J]. 政治学研究, 2000(3): 61-69. [He Xuefeng. On semi-acquaintance society: A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0(3): 61-69.]
- [20] 吴重庆. 无主体熟人社会 [J]. 开放时代, 2002(1): 121-122. [Wu Chongqing. Society without subject acquaintances. Open Times, 2002(1): 121-122.]
- [21] 郑容坤. 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半开放性及其纠纷治理 [J]. 党政研究, 2023(2): 29-40, 124. [Zheng Rongkun. The semi-openness of rural society and its dispute governanc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Studies on Party and Government, 2023(2): 29-40, 124.]
- [22] 陈志军, 徐飞雄. 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机理: 以关中地区为例 [J]. 经济地理, 2022, 42(2): 231-240. [Chen Zhijun, Xu Feixiong.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Guanzhong area as an example.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2): 231-240.]
- [23]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M]. Boston, USA: Beacon Press, 1944: 19-38.
- [24]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 [25] 黄中伟, 王宇露. 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理论研究述评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7(12): 1-8. [Huang Zhongwei, Wang Yulu. A review of social embedding theory on economic behavior.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07(12): 1-8.]
- [26] Brass D J, Galaskiewicz J, Greve H R, et al. Taking stock of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6): 795-817.
- [27] 张闯. 管理学研究中的社会网络范式: 基于研究方法视角的12个管理学顶级期刊(2001—2010)文献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1(7): 154-163, 168. [Zhang Chuang. Social network paradigm in management research: Literature research of 12 top management journals (2001-201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methods. Management World, 2011(7): 154-163, 168.]
- [28] 李秋成, 张环宙. 亲缘—产业二元网络对内生型乡村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J]. 旅游学刊, 2019, 34(12): 25-35. [Li Qiucheng, Zhang Huanzhou. The impacts of kinship-industry dual networks on the growth of endogenous small rural tourism business. Tourism Tribune, 2019, 34(12): 25-35.]
- [29] 李汉宗. 血缘、地缘、业缘: 新市民的社会关系转型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0(4): 113-119. [Li Hanzong. Blood, geopolitical and professional ties: Transformation of new urbanites' social relations.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13, 30(4): 113-119.]
- [30] 张环宙, 李秋成, 黄祖辉. 亲缘网络对农民乡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 基于浙江浦江农户样本实证 [J]. 地理科学, 2019, 39(11): 1787-1795. [Zhang Huanzhou, Li Qiucheng, Huang Zuhui. The impact of kinship network on peasants' tourism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ased on a sample of Puji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1): 1787-1795.]
- [31] 宋凡金, 王爱忠, 王东强. 统筹城乡发展中乡村旅游开发与农村空心化治理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5, 36(5): 755-759. [Song Fanjin, Wang Aizhong, Wang Dongqiang.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hollowing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5, 36(5): 755-759.]
- [32] 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智库课题组.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入乡“创业潮”探究: 基于湖北省的调查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4): 115-125, 128. [Research Group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trend" of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a survey in Hubei Province.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22(4): 115-125, 128.]
- [33] 刘亚秋. “家”何以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社会性基础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1): 84-95, 243. [Liu Yaqiu. Why does the family become the social basis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 2022(1): 84-95, 243.]
- [34] 李荣彬. 农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治理之道: 来自宗族网络的证据与解释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1(5): 129-138. [Li Rongbin.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 from the clan network.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21(5): 129-138.]
- [35] 孔祥利, 贺音.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支持 [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3(2): 66-79. [Kong Xiangli, He Yin. The path choice and policy support of cultiv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roups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53(2): 66-79.]
- [36] 梁冰瑜, 彭华, 翁时秀. 旅游发展对乡村社区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 以丹霞山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5, 30(1): 129-134. [Liang Bingyu, Peng Hua, Weng Shixiu.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o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rural society: Cases from Danxiashan scenic spot. Human Geography, 2015, 30(1): 129-134.]
- [37] 姚树荣, 周诗雨.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2): 14-29. [Yao Shurong, Zhou Shiyu. The research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2): 14-29.]
- [38] 马艳茹, 田北海. 责任意识、资源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 169-180. [Ma Yanru, Tian Beihai. The impacts of consciousness of responsibility and resource endowment on peasants' participation level in soci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4): 169-180.]
- [39] 明庆忠, 李志飞, 徐虹, 等.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的理论认知与应用创新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286-304. [Ming Qingzhong, Li Zhifei, Xu Hong, et al.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innovation of Chinese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286-304.]
- [40] 马历, 龙花楼, 屠爽爽, 等.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贫困村域演变特征与振兴路径探讨: 以海南省什寒村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 1435-1446. [Ma Li,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and vitalization pathways of poor villages based on multifunc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 A case study of Zahan Village in Hai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9): 1435-1446.]
- [41] 王璞, 周晨, 任建明. 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CSS2017的实证分析 [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 12(2): 82-96. [Wang Pu, Zhou Chen, Ren Jianming.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class statu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sense of gain in anti-corruption work: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SS2017.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2023, 12(2): 82-96.]
- [42] 巨英英, 程励. 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5): 1135-1149. [Ju Yingying, Cheng Li.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the tourism community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Based on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5): 1135-1149.]
- [43] Butler R W. 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J]. Canadian Geographer, 1980, 24(1): 5-12.
- [44] 李燕琴, 施佳伟, 罗湘阳. 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变迁机理: 聚焦发展期到巩固期的幸福拐点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8): 1514-1526. [Li Yanqin, Shi Jiawei, Luo Xiangyang. Mechanism of change i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The turning point of happiness from the development stage to the consolidation stag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 (8): 1514-1526.]
- [45] 陆林. 山岳型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 安徽黄山、九华山实证分析 [J]. 地理科学, 1997, 17(1): 63-69. [Lu Lin. A study on the life cycle of mountain resorts: A case study of Huangshan Mountain and Jiuhuashan Mountai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97, 17(1): 63-69.]
- [46] 苏明明, 董航宇, 王梦晗, 等.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村集体企业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旅游公司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 (8): 1587-1596. [Su Mingming, Dong Hangyu, Wang Menghan, et al. Generation path of village governance community led by village collective enterprises using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A case study of Yudong Tourism Company in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8): 1587-1596.]
- [47] 贺雪峰. 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1): 219-224. [He Xuefeng. Three themes of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Front, 2005(1): 219-224.]
- [48] 李锋, 王俊梦.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治理框架研究

-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5(4): 39-53. [Li Feng, Wang Junmeng.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3, 25(4): 39-53.]
- [49] Zhao W B, Brent Ritchie J R, Echtner C M. Social capital and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4): 1570-1593.
- [50] Xie J H, Yang G Q, Wang G, et al. How do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ffect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improving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J]. *Land*, 2021, 10(10): 1095. doi: 10.3390/land10101095.
- [51] 项慧燕, 何峰, 周国华, 等. 传统村落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及实证研究: 以湖南省郴州市4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5): 884-897. [Xiang Huiyan, He Feng, Zhou Guohua,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areas: A case study of four 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enzhou City, Hu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5): 884-897.]

Paths of tourism promot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reconstruction

LIU Minkun^{1,2}, SONG Yun^{1*}, DENG Xiaogui¹, REN Lili¹

(1.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2. Guangxi Development Strategy Institute,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Encouraging rural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in an orderly manner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Rural tourism can break spatial isolation and reconstruct the rural society, while rural residents' concepts and behaviors are profoundly shaped by their social networks. Therefore how tourism drives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reconstruction deserves in-depth study. Based on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d whether the path of "developing rural tourism- restructuring rural social network- promot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is valid and its mechanism through two progressive stud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an enhance the scale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rural kinship- geographic- industrial network and the network posi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crease the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and trust intensity of residents in the network, promot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reconstruct the rural social network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Social network affects residents'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four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ollective supervision, role model guidance, and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2) The rur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level of resi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operation is strongly promoted by industrial and geographic networks, and the rur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level of residents who do not participate in tourism operation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geographic and kinship networks. 3) Resident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activit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issues >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issues >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services.

Keywords: rural tourism;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social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relational embeddedness